

大时代的初中生

甘建华



著名作家王安忆说：“（上个世纪）七十年代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十年，这些大事，是曲折地波及到处在局部的个人生活。历史的动因在漫长的传递路途削弱了冲击力，但能量并没有消解，只是分散了，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，又是以什么形态体现出作用。”回想起来，我在茅市完小附中的求学经历，是可以用来象征这一点的。

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，从《中国青年报》上了解的大人物和大事件，每每让我们激动不已。甫一进校，就听闻毛主席纪念堂落成正式对外开放，数学家陈景润的感人事迹，杨乐、张广厚研究函数理论获得重要成果，等等。老师给我们讲述这些的时候，一个个眼睛全都泛着亮光。叶剑英元帅的诗歌《攀登科学高峰贵在有心》，张贴在学校的公告墙上，立马成为我们的座右铭，激励我们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。我现在依然记得这四句：“攻城不怕坚，攻书莫畏难。科学有险阻，苦战能过关。”叶帅另一首《八十书怀》尾联为世所颂：“老夫喜作黄昏颂，满目青山夕照明。”我至今还记得几位年龄较大的老师，在操场上摇头晃脑地吟哦的情形。

那一年，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重新公演，我前前后后看了四五次。音乐老师刘诗古先是在我们班教唱《手拿碟儿敲起来》，结果别的班级都停课了，全都跑到我们班窗外学唱。学校临时决定，其他各班都改上音乐课。刘老师站在操场上挥舞双手，指挥大家齐唱《这一仗打得真漂亮》，头发一甩一甩的，那个样子真是帅呆了。街上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闻讯赶到学校来看热闹，被师生们的情绪所感染，许多人也跟着一起唱。结果那段时间，茅洞桥到处都能听到《洪湖水，浪打浪》的歌声。刘老师又适时地组织学校文艺宣传队，组织两个年级的男女生排练，指名由我领唱，齐聚在金秋的阳光下演出，竟然轰动一时。连公社和附近大队、生产队的干部都跑来观看，嗣后将刘老师狠狠地灌了一顿胡之酒，弄得三天过后，他还对我们直嚷嚷：“头疼啊！头疼啊！”

这一年年末最重大的事件，就

是在邓小平的倡议下，全国恢复高考，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春天。听到从广播里传来的消息，茅洞桥许多人都不敢相信，到处互相打听：“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”平时看书就头疼、宁愿去挑土的我家姨妈，赶紧跑到学校找老师借书，可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哪里管用啊！那年有许多青年因此改变了命运，看到他们及其家人欢天喜地的样子，我们也增添了“读书有用论”的动力。到了第二年，国家决定恢复增设169所普通高校，以逐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，更让我们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和必胜的信心。那时茅洞桥再吝嗷的父母，也会从牙齿缝中抠出钱来，到镇上买些桐油和灯盏，供儿女们夜晚读书做作业。

1978年是一个大年份：在国家来说，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；在我家来说，返城重新吃上商品粮，父亲的问题也随之平反，原单位青海油田来函催促他即刻回去工作。年逾古稀的祖母高兴得直流眼泪，反复摩挲着我和弟妹们的头顶，再三嘱咐说：“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啊！我们全家要世代感恩邓小平啊！”

这一年3月8日，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少年班，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。以宁铂、干政、谢彦波为代表的神童，无疑是那个年代上演的最振奋人心的青春励志大片。但我们知道自己命运的前定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幸运儿赢在起跑线上。

有一天，上课铃响了，周道炳老师腋下夹着一本杂志走进教室，先是沉默有顷，之后低沉地说：“这节课咱们不上英语了，我给同学们念一篇小说，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。”现在想来，这可能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当面听人朗诵，虽然他不是专业的朗诵家，但在当时的我听来如闻天籁之音。我第一次知道谢惠敏、石红、宋宝琦的名字，知道“文革”对“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灵魂的扭曲”所造成的“精神的内伤”，听到了“救救被‘四人帮’坑害了的孩子”的时代呼声。尤其是描写张俊石老师的那一段，宛若是对周老师的人物速写。“他今年三十六岁，中等身材，稍微有点发胖。他的衣裤都明显地旧了，但非常整洁。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，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，也一丝不苟地

扣着。他脸庞长圆，额上有三条挺深的抬头纹，眼睛不算大，但能闪闪放光地看人，撒谎的学生最怕他这目光。不过，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，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，张老师却是一对厚嘴唇，冬春常被风吹得爆出干皮儿。从这对厚嘴唇里迸出的话语，总是那么热情、生动、流利，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，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，又像一把大条帚，不停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……”

第二学年下半学期，我们似乎有些情窦初开了，眼中开始有了女生的影子，有些大胆的女生也学会了抛媚眼。学校新招了一个补习班，他们的年龄普遍比我们大，社会阅历也比我们丰富，情书在男女生之间传递飞扬。我们截获时聚在一起欣赏，一个个笑得乐不可支，连池塘边的夹竹桃花和蝉鸣都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这一年，我们第一次知道中国女排，知道主教练是袁伟民，主力队员有孙晋芳、张蓉芳、郎平等。她们的个子那么高，她们的形象也那么高大。她们在亚洲女排锦标赛中，以3:1击败当时的亚洲和前世界冠军日本女排，首次称霸亚洲。从此，“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”，成为一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。

这一年，也是辉煌的八十年代的前夜，千军万马正在做抢渡文学这根独木桥的准备。我已经读过《林海雪原》《暴风骤雨》《山乡巨变》《边城》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等长篇小说，读过中外诗人普希金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、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、戴望舒《雨巷》、艾青《大堰河，我的保姆》，读到翻印的食指诗歌《相信未来》《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。我用节余的零花钱，买到了朱自清、杨朔、孙犁的散文选集，甚至拥有了两个纸箱的藏书。

这一年，我还读到了两位湖南作家的散文：一是蔡测海《刻在记忆的石壁上》，歌颂湘西山区的小学教师；一是杨里昂《油茶花赋》，歌颂湘中雪峰山区的农民，它们都润物无声地影响了我的写作。曾经离我那么远的两位前辈作家，多年后我们在长沙相逢相识，竟然结成忘年之交，也是当初始料未及的。

父亲的“鸟窝”草帽

蔡英

“噤，噤，父亲的咳嗽声从屋外传来。月光慢慢爬上树梢，给村庄笼罩上一层薄薄的纱。

自我记事起，每天晨光刚亮时，父亲就提着装满了工具的木箱，踩着单车去深山老林打石头，天黑才能回家。我是个敏感的孩子，总觉得是黑夜把父亲召唤回来的，它怕蛮子一样卖力的父亲太劳累。我还隐隐觉得，月亮是被父亲咳出来的，以至有些不愿意地给村庄光亮。多年以后，我对月亮仍怀着歉意，为父亲那一声声突如其来的咳声。

父亲随手将草帽挂在墙上，用力稍大了，细碎的黄泥巴沙沙地落下。这顶草帽是父亲三年前买的，原本嫩黄的颜色退成黑色，也不是纯粹的黑，而是黄中透黑，黑里带灰。帽檐掉下两圈窄窄的草边，散发着浓郁的汗味。帽子用铜线穿着，铜线外头包着的红塑料早被磨得光光的。帽子孤零零地守在墙上，像一个废弃的大鸟窝，给寂寂的夜色系上一个秤砣。

鸟窝？这名字是邻村的朱伯伯起的。那天傍晚，打米回来的朱伯碰到父亲，他细细打量一番父亲的草帽：这帽子破成这样，鸟做窝都会嫌弃呢！父亲当成趣事告诉母亲，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可天天从村里的代销店前经过，父亲仍舍不得买一顶新的。这顶“鸟窝”罩在他头上，安安稳稳如泰山，只是更破了。帽檐掉下来三四圈，趁落雨天，父亲将它们缝起来；汗味也更厚实了，同父亲衬衣腋窝处的黄渍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起风的时候，我怀疑“鸟窝”会只剩个骨架。

开家长会时，父亲穿着屁股上打着两个补丁的裤子，后脚跟上还粘着点点泥星，大大咧咧地挤进家长队伍里。一片衣着干净的人群里，父亲那顶“鸟窝”格外打眼。后来，班主任让父亲介绍予心得。他涨红着脸，汗如雨下，随手取下“鸟窝”急急扇风，半天才支支吾吾道：细崽子不打不成器，娇惯了会无法无天。我崽女要是不听话，还拜托老师多打！全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笑声，还夹杂着响亮的掌声。我远远地站着，脸上滚烫滚烫的，浑身像点了火一般。

我多次幻想这只“鸟窝”被风刮走、被雨打烂、被灰尘腐蚀，可它依然如影随地罩在父亲头上。父亲把牛哄进田里，乌亮亮的泥块从锋利的犁铧下翻滚出来，泥水淋漓尽致地洒了他一脸，有的甩到“鸟窝”上，开出一朵朵灰黄的花。父亲把铁锤握在手里，弯着腰向石头使劲地砍或凿，细碎的石粉欢快地扑向他满头乌发，有的趁机钻进“鸟窝”的空隙里。阳光喜欢在“鸟窝”里躲迷藏，东一束西一束，悄无声息地跳舞，谁也捉不着。山雨从天边奔涌而来，父亲护着头躲进山洞里，他甩甩“鸟窝”，一串串珍珠般的水滴下来。一只蚱蜢跳上“鸟窝”，好奇地瞅来瞅去。父亲轻轻将它捏下来，放进草丛里。歇息的时候，他把“鸟窝”丢在地上。一阵风来，“鸟窝”犹犹豫豫走走停停，一只花猫在后头追赶。父亲回过神，朝猫大喝一声，将草帽小心翼翼地套在头上。

有个秋天的夜里，月亮慢悠悠地在村庄上头逛，我惊奇地发现：“鸟窝”不见了，父亲居然戴着一顶半新的草帽！原来，父亲回家路上又遇到了朱伯，两人闲聊起来。趁父亲不注意，朱伯一把掀下那顶“鸟窝”，顺手扔到河里，再将自己的草帽迅速扣在父亲头上。父亲双手握着车把，怔怔地看着朱伯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那顶“鸟窝”呢，早随着水打着转儿漂走了……

在父亲将一顶顶新草帽变成“鸟窝”的时光里，我们渐渐长大了，先后走进大学，走进五彩纷呈的外部世界，父亲也一日日老了，糖尿病、支气管炎等疾病将强壮如牛的他折磨成步履蹒跚、瘦骨嶙峋的老头。看着他一步步挪着笨拙的身子，慢慢地走在菜地里，手里是一把锄头，头上是一顶旧草帽，我恍惚回到了那遥远贫寒的少年时光。

那些“鸟窝”最后去了哪里？也许被大鸟捡去做窝了，还孵出了很多健壮可爱的小鸟吧。